

严复译介《天演论》的旨趣及其产生的影响与论争

朱 东 华

(广东省肇庆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肇庆 526000)

摘 要: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结局极大地震惊了中国社会。在此背景下严复翻译《天演论》,物竞天择的竞争进化论遂由此倡行国内,且被维新人士改铸为国际竞争理论,为激励国人奋起救国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然一战爆发后,中国处境危殆,其时文化人将大战之祸归罪于竞争进化学说,指出应以互助论进化观取代竞争进化论。此种氛围消解了竞争进化论下凸显的国家观,促成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的回归。

关键词:严复;《天演论》;竞争进化论;互助进化论;大同思想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5-0076-06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引发了戊戌变法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等人对世界形势的认知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员们。不过,国人对其时国家在世界上处境认识深化的表现,集中表现在严复对人类竞争进化理论体系的引入。

一、严复译介《天演论》的目标取向及影响

甲午战后,严复对中国处境危机的分析与康有为有所不同,尤其在对中国“精神危机”的认识与康氏有明显的差异。康有为认为中国“治法文学”极弱,提出了“保教”的主张。严复亦认为中国“治法文学”不如西洋,但却提出了改造中国“治化”的主张。两人都认为中国在物质和精神力量上均难以与西方抗衡,国家危机意识相当强烈。

严复在认识 and 理论上高于康有为之处在于他 1898 年翻译《天演论》一书,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介绍引入刚遭遇甲午战败的中国社会,为国人认识当时国际格局的险恶和中国在国际上处境的危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1](14)}严复不仅翻译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也向国人介绍传播达尔文的物种竞争进化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有两个主要理论指向,一是强调万物都处于进化过程中,一是进化的动力是竞争。严复译介《天演论》的主要旨趣不在强调万物进化的必然性,而是重点介绍竞争进化的进化法则,把国际社会解释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场所。^{[2](1350-1352)}同时大声疾呼并告诫国人,中国已经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境地。当时,《东方杂志》亦不断发表社论,号召国人奋起竞争,挽救国难。该杂志的一篇社论说,国家必须“自存而后能自强”,“天演家物竞争存之旨,莫要于存其所最宜”。但中国“官民”已“不宜于今之世界”。如不改变,必然被淘汰。^[3]

严复引入竞争进化理论,为当时的中国建构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知自己处境的图式,很快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第二年,梁启超根据这一理论,对当时国际社会的竞争大势作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朱东华(1975—),女,广东省肇庆学院 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肇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ZC-13);肇庆学院教师教育研究专项资助项目(JSJY201109)

了颇有影响力的论述。他说:国际上的竞争“有国家之竞争,有国民之竞争”。“国家竞争”是“国君”驱使其人民与他国竞争。“国民竞争”是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竞争。中国历史上孔子、墨子、孟子所谓国家之争就是国家间之竞争。近代以来,欧洲理论家所说,“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争者文明之媒也”,以及指“国民之竞争”。国家竞争的力量单薄,国民竞争的力量强大。国家竞争的时间短,国民的竞争时间长。^{[4](57)}

梁启超的论述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受到严复译介《天演论》的影响,认定国家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合理性的。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形成了两个差异很大的国体,这两大差异决定中国与欧洲的竞争形势完全不同。^{[4](66-67)}

梁启超把中国国内的统一与世界各国的并立视为同一事物的两种样式,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优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并立。梁启超还认为中国是一个无阶级的国家,这种无阶级也优于西方有阶级的国家,并以此论证中国古代比西方发达的原因。但是,梁启超的这一理论却不能说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因此他又解释因为中国的大一统导致了闭关自守,长期不明白自己与世界处于竞争状态的实际情况,从而造成了竞争意识不强。同时,中国又因为无阶级而使国内人民缺乏权利意识,导致无对外竞争观念。但是,近代国际世界的现实则是中国与各国同处于竞争场域,已经由统一而转化为并立,同时也已经由无阶级转变为有阶级的国家。但中国仍然实行统一而无阶级的旧制度,这当然不可能有竞争胜利的可能,因而只能以“退步求进步”。也就是说要放弃理论上先进的统一和无阶级的制度,以适应国际上有阶级的各国并立这种“落后”状态,中国才有转弱为强的希望。梁氏的理论体系显然难以自圆其说,但他说明了当时的中国现状已与世界竞争格局不相适应,必须改变观念,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同处国际竞争的场域之中。从这种理论出发,梁氏指出中国如不奋起竞争,就毫无图存希望。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对世界是国与国竞争的大势和中国在这种格局下的处境作了清晰的论述。他说,“帝国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强大的“民族自移殖于劣弱民族所居之地”,占领其国家,一种是优强“民族能以同化力(能化人使之同我谓之同化力)”,同化“劣弱民族”“抹煞其界限”,把弱小民族变成自己的被动统治民族。^{[5](11)}最近三十年以来,经过激烈的民族竞争,“全欧均势”已经形成,西方人只有到“欧洲以外之天地”去竞争利益。他们在亚洲之竞争已经过第一阶段而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竞争的中心就在“中国”。^{[5](24)}这一竞争本质已转变为“脑力”和“市场”的竞争。“欧人”把“中国”“视之与其既得主权之殖民地(如印度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这同等的殖民也。而且其以“特别不平等之法律”以制中国于“死命”。处于这种“优胜劣败”的境地,“中国民族之前途”已不堪想象。^{[5](24-29)}

梁启超运用严复译介的社会竞争进化旧论解释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在这一形势下的处境,清楚地说明了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途径,中国已经处在列强在亚洲竞争的中心点之上。并说明列强对中国既进行旧殖民主义式的侵略,又以新殖民主义形式掠夺我中国利权,通过他们制订的国际市场法则把中国置于劣败的地位。可见,这时的梁启超还是严复译介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宣播者。出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进化法则的认知,他们把中国的民族危机观念推到了最高峰。在这批知识精英的宣传与影响下,中国开始突破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逐渐接受了世界各国为利益而奋力竞争的全新认知,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中国的形势,产生了竞存的强烈意识。

二、一战爆发后国人对“天演观”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对竞争进化观的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人们接受了竞争进化学说的结果,因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批判。

大战结束之际,当初连载《天演论》的《东方杂志》转而连续刊登反对社会竞争进化论的文章。其中一篇便是陈长蘅的《进化之真象》。陈在文章中指出,进化有天演进化与人演进化。并说天演进化的法则是“最适者生存”,人演进化之法则“最适者生存”,“最善者”更应“生存”。演变结果会导致最“适”者

逐渐变成最“善”者。^[6]因此,陈长蘅主张要人为扩大“人演之范围”,缩小和改变“天演”进化的趋势。人为的进化即是按人的意志,按照“较丰富康强,较高尚文明,较公正纯善,较自由快乐,较完全美满,较光荣神圣”的道德进化,这就能合“个人生活与共同生活”日益变得美好。这是一种求“善”的“进化”。^[7]从理论上讲,“恶”是指排斥他人,谋求利己,“善”指利于他人求得共同发展。“为善”的进化就是谋求大家共同发展,人的进化。按照这一见解,进化就不应有竞争进化,而要走中国传统的尚同之路,这就在理论上否定了严复译介的竞争进化学说。

杜亚泉在大战即将结束时已提出一种预言,他说“未来世界”决不会继续“现世界”的道路,不会在“现世界”之上进步,而会对现世界加以转换,甚至“反动”。凡是考虑“未来生活”的人都要对这一点“加以注意”。如果仍然把“世界”理解为弱肉强食之世界,崇尚“金钱万能”的世界,埋没“良心”,把“精力”“身、命”都全部放进“自由竞争之旋涡中”,等到世界形势一变,国人就将悔之晚矣吾。^[8]杜亚泉这一论述指明,正是因为世界各国奉行竞争进化法则,才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祸,从而证明了竞争进化观的错误。他还指出了这种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不会长期存在,必然发生反向转化。

梁启超在大战结束之初游历欧洲,写下欧游游记,在游记中他对先前十分推崇的竞争进化学说的态度一变而为坚决否定。他指出:尼采把“剿绝弱者”视为人的天职,是“世界之进化”的需要。“达尔文的生物学”就是尼采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一时适合了“当代人的心理”,因此个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被视为“天经地义”。国家则提倡“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而且视为“最时髦”政策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实际就在于此。^[9]⁽¹⁶⁾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但他实际上对当年由严复引介的,他自己也广为宣扬的竞争进化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少年中国》杂志刊载了魏嗣銮《人类进化的各面观》一文,更明确指出一战“以前,达尔文的学说”受到全“世界”的欢迎,造成了“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观念成为人们的普照遍观念,因此导致了了国与国之间为自己的利益奋起冲突,最终导致大战发生。^[10]曾经是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亦著书立说,对竞争进化论进行批判。他在书中指出,西方文明都视“竞争”为世界进步的原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论”就是西方这种观念的“代表”。在这种文明之中,“国家与国民”,都会走上“功利主义”的道路。正是这种“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欧洲大战之惨祸”。^[11]⁽¹³⁰⁾对竞争进化论造成世界大战,蔡元培也作论述,他说:由于有达尔文“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的理论学说,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应根据其学说来教导人民,使西方人都以为“汰弱存强为人类进化之公理”,认为“强者”怜悯弱者”是一种为“奴隶”着想的道德。德国的统治者就用尼采的学说认识国际关系,所以产生了“军国主义”。^[12]⁽⁴⁾

在理论上,达尔文物种进化的竞争原则是否能够直接引入社会理论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康有为等人把严复译介的社会竞争进化观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的新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有利于国人认清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危险处境,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大同理想的回归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国家间恶性竞争的结果。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解释。因为如此,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政界人士把战争归于竞争进化学说,对竞争进化论加以全面否定,同时希望战后国际之间消除利益之竞争,以求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思想界于是抛弃竞争进化,认同互助进化论。

杜亚泉1915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社会协力主义》一文,指出“竞争与协力”,是完全相反的理论,讲“协力”者追求共同利益,讲“竞争”者则将产生利害冲突。“国家主义者”认同“政治上之关系”或“民族”关系所构成的国家。“平和主义者”则赞成以“全体人类为界”,而不分国界。世界发展到当时的时代,人类历史的发展已形成“国民之协力,进而为人类之协力”路向。因此,处在这一时代,中国人应在“确保国民之协力”时,进一步谋求“人类之协力”,这是“二十世纪”之大趋势。^[13]杜亚泉的观点发表在关心世界大势的《东方志杂》上,应很有代表性,说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关系格局的看法已

开始转变,已开始认为20世纪全世界的国家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个国家将由过去为利益竞争的取向转为争取以人类为界而不是以国家为界的永久和平的取向。

由于有上述认知取向的变化,在这个时段,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对社会主义理论加以关注。《东方杂志》转载了刘大钧的《社会主义》,该文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并从中引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灭亡之道”,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本为“私人所有”,因而带来了“今日社会之弊”。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使资本“全为社会所公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善”道路是阶级斗争。^[14]文章中还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过阶级斗争实现财产公有制理论也有相对准确的介绍。其他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则大多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造思想,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等。许多人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楚,并不以社会主义称之,而说它是过激主义。^[15]这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不一致,但都强调社会平等、公正、和平,反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进化观。

1919年,李石曾翻译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文,《东方杂志》在是年5月加以连载。李石曾在译者《弁言》中说:他翻译此文“非仅欲以此”完成朋友交给的文责,主要意在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已证明“互助与竞争”之优劣。国人不能再忽视《互助论》的重大理论意义。^[16]它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国际竞争必然导致战争,中国须明白这一道理,抛弃竞争进化观,赞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共谋世界和平。蔡元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是为公理而战,因而能够战胜德国。这一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在国际上“应用互助主义”,使“人道主义”得以发扬。^{[12](4)}此时,孙中山也在建构互助进化理论体系,他把世界的进化划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并指出“物种进化”才以“竞争”为法则,“人类进化”则依靠互助为动力。^{[17](141)}孙中山理论也源自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说:世界上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国际战争”,一是“商业战争”,一是“阶级战争”。他认为解决这三个大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在互助,不在于竞争”。^{[17](334)}上述分析表明,当时的文化人和政论家都认定互助进化与竞争进化之间存在水火不容的关系,为实现人类的真进化就必须用互助论进化理论取代竞争进化理论。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份子认识国际关系的理论已发生了重大转向,对中国人民认识国际关系格局,理解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因素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实现世界和平当然需要国家之间的互助,但当时知识分子理解的国家互助并不是国际之间平等互利的共谋发展,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消除国界的天下大同理想。按他们的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战胜了强权。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人类将从根本上放弃竞争,热心国际互助,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巴黎和会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讲演中提出了处理战后国际问题的十四条宣言,宣言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国际联盟”的组织来保证世界各国的“自由”和“主权”完整,以及国际上无论大国小国,都能享有平等“利权”等主张。^[18]威尔逊发表此宣言目的是要保证在战后美国的最大利益得以实现。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却普遍在中国古代大同观念思想下去理解威尔逊的宣言。当时影响面很大的《申报》等一些大报都发表文章赞扬威尔逊宣言,认为依照他的宣言,就能实现“世界平民主义”,就能达成“永久和平之目的”。^[19]这个愿望实现后,中国就会成为和平世界的平等一员,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给中国的一切不公正待遇都将自然消失。^[20]世界各国将不再追求“功利”,一心“造成文明进步”,全世界都遵守共同认可的“条约”,自觉“取消种种特别之规定”,这样就可以造成永久的世界和平。^[21]

上述大同理想被一些学者表述得更加美好。梁启超就曾说大战后由美国倡导,即将建立的国际联盟必然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光彩事物,巴黎和会一定能够使这种体现“人类大合同,大进化”“国际同盟”的基础加以构筑。中国只要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国际事务,就能在这面“正义人道”的“旗帜下”强大起来,过去的一切受侵略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消除。^[22]他说,“国际同盟”就是实现未来光明的“世界大同”的最重要的“手段”。^[23]领导国民外交协会的林长民等著名人士在评论国际联盟时也说,中国人历来“爱和平”,古代就有“世界大同”的理想,如今遇到这种有重大意义的和会,十分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其中,推进这一大业,以便从根本上“铲除世界祸乱”的根源,以造成“永久太平”。^[24]上述说法尽管各

不相同,但都希望由此实现理想的天下大同,使中国由 1840 年以来被动强加的一切不平等待遇彻底解除。对这一愿望,蔡元培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前就明确表述过,他说,我们对现在的国家组织,都不“满意”,现在的国家必将被人类全体平等相处的世界组织取代。他举出已经出现在世界的“红十字会”、“各国工会”和“思想学术”这些没有国界的事业,说明人类正在走世界“大同”。将来实现“理想之世界”不难想象。^{[25] (27)} 陈独秀则在当时提出了破国家偶像的见解。他说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世界上正是因为有“国家”,才造成了“国际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国家“偶像在那里作怪”的结果。他要求各国的人民抛弃国家“偶像”,认识“世界大同的真理”,去求“真正和平的幸福”。^[26] 对大同理想,李大钊在巴黎和会召开前也有典型说法。他认为只要巴黎和会能变成“世界的议会”,国际仲裁裁判转化为“世界法庭”,建立起“国际警察”,再把国际联盟发展为“世界的行政机关”,就能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样我们人类全体期盼的“世界大同”理想就实现了。^[27] 李大钊肯定说,现在人群的进化,都在“沿着一条线走”,目的地就是“世界大同”。^{[27] (131)} 这些言论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李大钊这时尽管已经一定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但他的理想仍然是无种族,无国界,人类全体平等相处的天下大同。

上述理想是中国文化中天下大同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在大战结束后,经过媒体的宣传,很快就转化成了中国人的共识。在民众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各种活动中,到处响彻着“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内在精神就来源于天下大同主义的理想。各地官方和民间共同庆祝大战中协约国的胜利,形成了普天同庆的氛围。《申报》在评论上海的庆祝活动时指出:昨日以来,上海庆典的盛况,实为“前此所未有”。这次“公理与暴力之战”,协约国的胜利,不是“武力”战胜,而是“公理与人道”的胜利。战争的结果使“民治主义”得以发扬,“世界永久和平”得以实现,其意义远远不是平常战争以武力“克敌奏凯”可比。“武力”胜利只是胜利者的胜利;“公理与人道战胜”,则是人类全体的“胜利”,因此只要是“有生之灵”都在加以庆祝。^[28] 这种理解说明,中国人之所以空前热烈地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的协约国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再造天下太平之战。在他们的心目中,“公理与人道战胜”,就是普世太平,天下大同理想的彻底实现。严复译介的竞争进化学说已经被彻底否定了。这对中国人认识世界形势造成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

甲午惨败给中国带来的危机促使严复译介《天演论》,其鼓吹的竞争进化论给国人指明以竞争谋利、奋起争存的天演图式,并深为国人服膺。在此氛围中,中国传统天下观逐步消解,现代国家观念日益凸显并一度空前强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此种国家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当初竭力推崇竞争进化论,并以此证明中国处境危殆的文化人转而对这一理论提出了否定性的评判,他们将一战之祸归罪于竞争进化学说,指出为避免战争就须以互助论进化观取代竞争进化论。此种氛围消解了甲午战后《天演论》所倡导的竞争进化论下凸显的国家观。一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巴黎和会的召开,更让中国文化人倍受鼓舞,认为世界大同即将实现,处于大同世界的各国将以公理为准则,不再追求本国利益,均会非功利地谋求世界全体平等、公正的共同幸福。中国在此世界不仅不会再受压迫欺辱,而且 1840 年以来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将自然解除。在此类理想氛围中,鸦片战争之后传统天下观逐步消解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性国家观念,以及甲午战争激起的中国奋起求强的意识已大为淡化,很大程度上已被较天下观更古老的大同理想所替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悖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态。

参 考 文 献

- [1] 严复译. 天演论·复按[A]. 刘梦溪主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Z].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2] 严复. 天演论·复按[A]. 王栻主编. 严复集(第五册)[Z]. 中华书局,1986.
- [3] 社说. 自存篇[J].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五期,1905-06.
- [4] 梁启超.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A]. 饮冰室合集(1) 饮冰室文集之四[Z]. 中华书局,1989.
- [5] 梁启超.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A]. 饮冰室合集(2) 饮冰室文集之十[Z]. 中华书局,1989.

- [6] 陈长蘅. 进化之真象[J]. 东方杂志, 第 16 卷第号, 1919 – 01.
- [7] 陈长蘅. 进化之真象(续)[J]. 东方杂志, 第 16 卷第 2 号, 1919 – 02.
- [8] 伦父. 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J]. 东主杂志, 第 15 卷第 10 期, 1918 – 10.
- [9] 梁启超游记[M]. 东方出版社, 2006.
- [10] 魏嗣銮. 人类进化的各面观[J]. 少年中国, 第一卷第一期, 1919 – 07.
- [11] 徐世昌. 欧战后之中国[A]. 沈云龙编.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一辑[Z]. 文海出版社, 1966.
- [12] 蔡元培. 我之欧战观[A].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Z]. 中华书局, 1984.
- [13] 伦父. 社会协力主义[J]. 东主杂志, 第十二卷第一号, 1915 – 01.
- [14] 刘大钧. 社会主义[J]. 东方杂志, 第十五卷第十一号, 1918 – 11.
- [15] 罗罗译. 过激主义及其失败[J]. 东方杂志, 第十六卷五号, 1919 – 05. 君实译. 过激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对抗[J]. 东方杂志, 第十六卷第八号, 1919 – 08.
- [16] 李石曾译. 互助论(弁言)[J]. 东方杂志, 第十六卷第五号, 1919 – 05.
- [17]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A]. 孙中山选集(上)[Z]. 人民出版社, 1956.
- [18] 王绳武主编.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Z].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 [19] 组织国际和平研究会[N]. 申报, 1918 – 12 – 07.
- [20] 中国与和平会议[N]. 申报, 1918 – 12 – 07.
- [21] 中国与和平会议(续)[N]. 申报, 1918 – 12 – 08.
- [22] 梁任公敬告友邦当局[N]. 申报, 1918 – 11 – 17.
- [23] 梁启超. 国际同盟与中国[J]. 东方杂志, 第 16 卷第 2 号, 1919 – 02.
- [24] 国民外交协会之外交意见书[N]. 晨报, 1919 – 05 – 02.
- [25] 蔡元培. 在清华学校高等专科演说词[A].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Z]. 中华书局, 1984.
- [26] 陈独秀. 偶像破坏论[J]. 新青年, 第 5 卷第 2 号, 1918 – 08.
- [27] 李大钊.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A]. 李大钊选集[Z]. 人民出版社, 1959.
- [28] 庸. 三日间之大庆祝[N]. 申报, 1918 – 10 – 22.

On Yan Fu's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Its Influence and Argument

Zhu Donghua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ZhaoQ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Zhaoqing 526000, China)

Abstract: Yan Fu's translation of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had caused the prevalence of contest evolutionism among Chinese society, especially after China's fiasco in the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 1895 and the shock resulting from it. The theory of contest evolutionism provided the reformists a basis to develop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deas, which had been spurring Chinese people to campaig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ir country. However, the outbreak of the World War I changed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y ascribed the reason for the world war to contest evolutionism, announcing that the domination of mutual – aid evolutionism, instead of contest evolutionism, have to take place to avoid wars. This historical milieu dissolved, more or less, the state conception which Evolution and Ethics had helped shape, and led to the resurrection of Great Harmony thoughts.

Keywords: Yan Fu;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contest evolutionism; mutual – aid evolutionism; Great Harmony thoughts